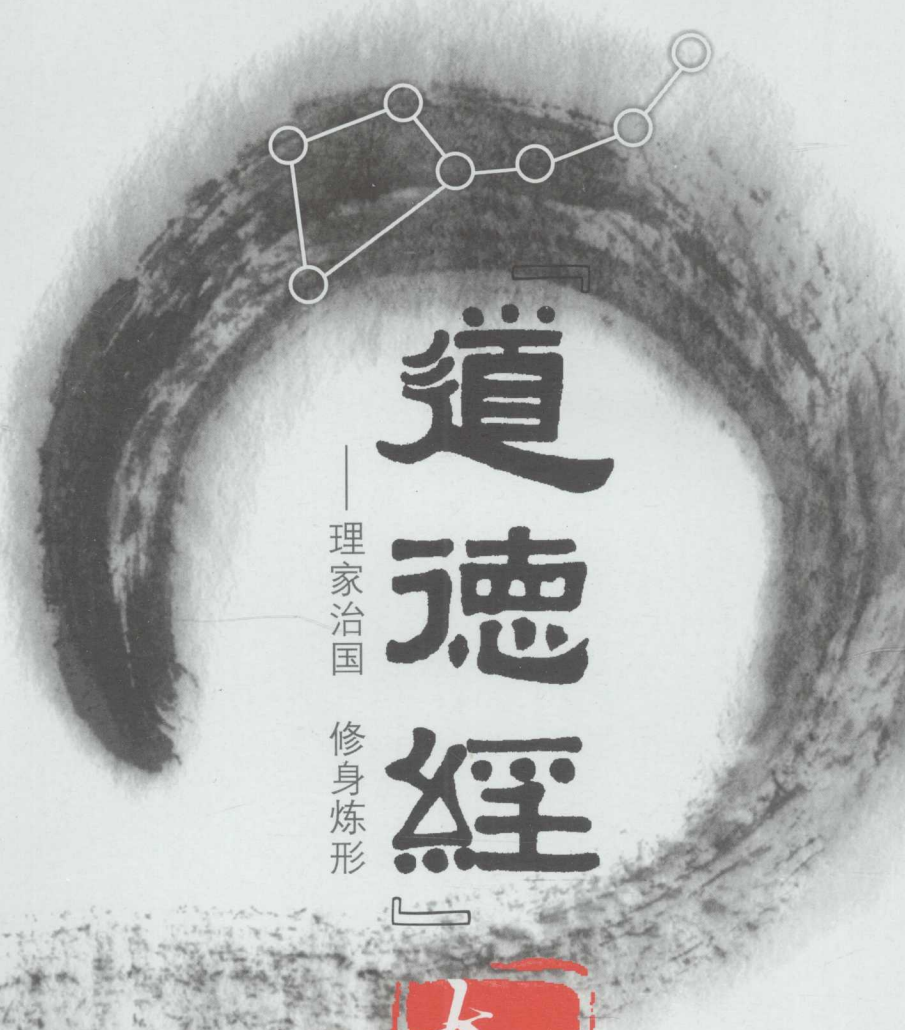


戈萍著



道德经

——
理家治国

修身炼形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
戈
萍
著

『道德经』本义

——理家治国
修身炼形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道德经》本义：理家治国 · 修身炼形 / 戈萍著 . — 成都：成都时代出版社，2009.7

ISBN 978-7-5464-0034-1

I . 道… II . 戈… III . 老子—研究 IV . B223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4571 号

《道德经》本义 ——理家治国 修身炼形

DAODEJING BENYI—LIJIA ZHIGUO XIUSHEN LIANXING

戈 萍 著

出品人 秦 明
责任编辑 李 林
责任校对 郭 红
装帧设计 创意坊平面设计工作室
责任印制 莫晓涛

出版发行 成都传媒集团 · 成都时代出版社
电 话 (028) 86619530 (编辑部)
(028) 86615250 (发行部)
网 址 www.chengdusd.com
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
规 格 154mm × 230mm 1/16
印 张 21
字 数 300 千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4-0034-1
定 价 35.00 元

著作权所有 · 违者必究。举报电话：(028) 86697083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工厂联系。

电话：(028) 85910167

本书主要参考文献

楼宇烈：《王弼集校释·老子道德经注》

河上公：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》

高明：《帛书老子校注》

廖名春：《郭店楚简老子校释》

杜光庭：《道德真经广圣义》

吴澄：《道德真经注》

俞樾：《老子平议》

易顺鼎：《读老札记》

奚侗：《老子集解》

马叙伦：《老子覈诂》

蒋锡昌：《老子校诂》

朱谦之：《老子校释》

陈鼓应：《老子注译及评介》

钱穆：《庄老通辨》

裘锡圭：《郭店〈老子〉简初探》（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十七辑）

赵建伟：《郭店竹简〈老子〉校释》（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十七辑）

李学勤：《荆门郭店楚简所见关尹遗说》（邢文编译《郭店老子与太一生水》）

许抗生：《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》

侯才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〈老子〉校读》

徐志钧：《老子帛书校注》
聂中庆：《郭店楚简〈老子〉研究》
尹振环：《楚简老子辨析》
彭 浩：《郭店楚简〈老子〉校读》
刘信芳：《荆门郭店竹简老子解诂》
罗根泽：《罗根泽说诸子》
张松辉：《老子研究》
冯铁流：《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》
冯达甫：《老子译注》
雷敦龢：《郭店〈太一生水〉校笺》（邢文编译《郭店老子与太一生水》）
孔颖达：《周易正义》
高 亨：《周易大传今注》
王聘珍：《大戴礼记解诂》
黄怀信：《鹖冠子汇校集注》
张岱年：《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》
江林昌：《中国上古文明考论》
郭沫若：《青铜时代》

目 录

001 绪 论

- 一、在忧患中诞生以谦谦君道为核心的西周《老子》
- 二、老聃、太史儋是西周《老子》的保存者与传播者
- 三、五千言本《道德经》最早集结成书在战国末期，乃
吕不韦所为

037 附：西周《老子》还原

041 《道德经》校释

《道经》校释

《德经》校释

313 《太一生水》校释

328 后 记

绪 论

“这些年来简帛书籍出土虽多，能兼有战国时本与秦至汉初时本的，只有《周易》经文与《老子》两种。这在文献学研究上，是非常难得的特例。”（尹振环：《楚简老子辨析·序》）李学勤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这个文献学研究上的特例，恰恰从一个方面印证了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两书在先秦及秦汉时期极其重要又极其特殊的地位。

《周易》号称群经之首，从传说的伏羲始作八卦，至殷末周初周文王的推演、周公的主持编修，最终建立起天地人三道合一的一套认识系统，影响了中国几千年。这是周王室的第一国宝。然而，西周王室还诞生了另一件“国之利器”——它最早将《周易》的思想应用于现实政治，它一直与帝王发生着密切联系，它是被改窜得最厉害的一部国家典籍。它就是原始本《老子》！

郭店楚墓竹简本《老子》的墓主人是“东宫之师”（又或以为郭店楚墓出土的漆耳杯杯上之“师”字当为“杯”字，然都与王位继承者太子有关）；唐代傅奕校订的《道德经古本篇》，出自灭秦的西楚霸王项羽妾之冢；帛书本《老子》的墓主人被推测为西汉第一代软侯、长沙国丞相利仓之子。再往后，汉初皇室将其定为经典，名曰《道德经》；唐宋明清有四位皇帝——唐玄宗、宋徽宗、明太祖、清世祖更是相继御批《老子》……或暗或明，自春秋以降，《老子》一直都在王侯门第延续着、传承着。回望先秦那些“以干世主”的诸子之学，无有能出其右者。这难道仅仅是一个特例或偶然？我以

为,《老子》之登上王廷,除了它本身即是“帝王之学”外,还因为它并非出自诸子之手,而是与《周易》一样由王室组织完成的。后世帝王的注老解老,既是王道之需要,亦是对传统之谨守,正所谓“善撻者不拔,善抱者不脱,子孙以其祭祀不辍”。

可以说,《周易》和《老子》一阳一阴,最初皆为周朝的国家利器,只有周天子得专享之,秘不外传。东周时周势日衰,史官与乐师等纷纷出走,两“利器”开始流传于诸侯之间以为用。

一、在忧患中诞生 以谦谦君道为核心的西周《老子》

老子是谁?《道德经》成书于何时?这个问题纠缠了两千多年,仍莫衷一是。之所以要苦苦追问那个两千多年前的“故人”、“故纸”,是因为要真正读懂《道德经》,这是首先应弄清楚的问题。

随着出土文献的越来越多,研究者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:先秦及秦汉之际的诸子之书,几乎都经历了从口传心授到集结成文字,又不断被后学添加改动的漫长成书过程,所以我们看到同一本书概念不统一、用语混乱、思想驳杂等现象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叠加”成书说。《道德经》的成书,“叠加”痕迹尤其明显,一如江林昌先生所说:“竹简本《老子》与通行本、帛书本《老子》的不同,不是简单的文字改动,而是不同历史阶段的道家学说的具体内涵有变化差异的反映。”(江林昌:《中国上古文明考论》44页)为此,《道德经》的研究者们逐步打开思路,尝试运用考古学、文本结构学、训诂学、历史学等等展开新一轮的综合研究,希望找出那个真正的“老子”,找到那个原始本的《老子》。我以为,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,文本思想始终是我们进行“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”的基础,这一点不可偏离。

夫此道德二字者,宣道德生畜之源,经国理身之妙,莫不尽此也。昔葛玄仙公谓吴王孙权曰:《道德经》者乃天地之至妙,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神道焉,大无不包,细无不入,宜遵之焉。(杜光庭:《道德真经广圣义》)

三国道士葛玄分析出的《道德经》天道、人道、神道“三道”主题，为我们厘清了《道德经》一书的基本思想构成。追溯这“三道”的演变历程，结合各学科的研究成果，并将目光着重放在帝王序列，我们将尝试着去解读千年奇书《道德经》的成书之谜。

（一）刘歆《诸子略》明确指出《道德经》最初人道部分的思想乃“君人南面之术”，以卑弱谦让为特征

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，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，然后知秉要执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术也。合于尧之克攘，《易》之谦谦，一谦而四益，此其所长也。及放者为之，则欲绝去礼学，兼弃仁义，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。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

上述刘歆在《诸子略》中对道家源流的评述，指出道家思想的根本是“君人南面之术”，且最初以“卑弱谦让”为主旨，帛书本德经在前、道经在后的编排方式可以作为印证；至于“绝礼学”、“弃仁义”、“独任清虚”等观点，则是道家后学一次次“叠加”进去的——“放者为之”。也就是说，《道德经》最初内容主要谈“人道”，实质即君道，以“卑弱谦让”为特征。如果向上追寻“卑弱以自持”之君道产生的特定时代，将有助于我们找到那个原始本《老子》。

仔细分析刘歆论道家的这段话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具体的认识。

1. 《道德经》最早出于史官之手——“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”。刘歆得出这样的结论，除了因为当时公认为写《道德经》的作者是周守藏室之史（又称柱下史）老聃，还在于他发现，《道德经》一书的内容有不少都是历史资料、格言警句，“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”。以史为鉴献书进言正是史官之职。

2. 《道德经》最初目的是要确立君道之本——“君人南面之术”。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也指出，《道德经》宣示的是“经国理身之妙”。这就是说，无论是诞生之初，还是后来被改造集结成五千言本，《道德经》始终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，是帝王之学，故实用性、针对性很强。

3.《道德经》提出的君道以谦柔为本——“卑弱以自持”、“克攘”、“嗛嗛”。这是一套非常独特的治国思想，完全有别于《周易》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积极有为精神。看看《道德经》一书，尽是一些教人守柔戒强的警句：“强梁者不得其死”、“坚强者死之徒也；柔弱生之徒也”、“知其雄，守其雌”、“吾不敢为主而为客；不敢进寸而退尺”……唠唠叨叨，一再申戒君王要处弱和克制。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。试想，这该是怎样一个特殊的时代？被进言的君王正面临怎样的忧虑与困境，非得如此戒惧、隐忍不可？张松辉对此深有感触，他在《老子研究》一书中说：“包括《庄子》在内的先秦典籍中，老子是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。”钱穆力主《道德经》晚出于《庄子》并深受庄子思想影响，但也看出其不同于庄子的深刻的现实性：“可见老子思想，最自然，还是最功利的。最宽慈，还是最打算的。”（钱穆：《庄老通辨》）这种功利与打算，正源于那深深的忧患。忧患，不就是产生“卑弱以自持”之君道的时代土壤吗？

4.《道德经》谦道思想的源泉是《尚书》和《周易》——“合于尧之克攘，《易》之嗛嗛，一谦而四益”。《尚书·尧典》云：“帝尧曰放勋，钦明文思安安，允恭克让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。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”《尧典》是王国维认为可信的二十九篇《尚书》史料中的一篇。“允恭克攘”即“允恭克让”，“攘”为“让”之古字，意思是信恭能让。“克让”是五帝之一的唐尧施行德治的重要内容，此可谓是以先圣为鉴。另一个源头便是周人自己的杰作——《周易》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中即有“谦”卦：“谦：亨，君子有终。”意思是君王若要保持王位的长久，就必须谨守谦道。“一谦而四益”者，谦卦彖辞所谓“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”也，从天、地、鬼神、人阐述谦受益的道理。《周易》是谦让思想最直接的理论源泉，此可谓是以先祖之法典为鉴。

由此我们不禁要问，一个能掌握周王室核心文献《尚书》和《周易》的人，一个有着深刻忧患意识的“知识分子”，一个提出“卑弱以自持”之特殊国策的史官，那位写原始本《老子》的老子会是谁呢？

如果是司马迁说的那个周守藏室之史老聃，他能接触到《尚

书》、《周易》等重要文献，或许也有资格去写原始本《老子》（按理太史才可献言，不知当时守藏室之史与太史是否为一职），但缺乏与这套主张吻合的时代需求和文化土壤。从《礼记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等文献记载来看，老聃与孔子（公元前 551 年—前 479 年）同时而年长孔子三十来岁，孔子曾多次向他请教有关礼的问题，那已经是周平王东徙雒邑（公元前 771 年）两百年后的春秋末叶了。此时周天子式微，政由方伯，偏安一隅的周王室除了自保，已无暇它顾。

……周宗既灭，靡所止戾。正大夫离居，莫知我勩。三事大夫，莫肯夙夜。邦君诸侯，莫肯朝夕。庶曰式臧，复出为恶。（《诗经·小雅·雨无正》）

这首诗是对西周灭亡东迁后，王室与诸侯离析、王室内部人心离散发出的悲叹。从诗中我们看到，此时的周王室不仅丧失了天下共主的权威，且国力疲敝，朝廷内部问题重重。试想此时的周王室哪里还有心思和能力组织史官制定新政？在东周的历史记载中，也不曾出现过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天子。而且就算有这么一位天子，有重振王室的雄心，面对积弱、涣散的王朝，应当采取霹雳手段以求革故鼎新，怎么可能还主张守弱谦退呢？所以，在老聃所处的春秋末年，是不可能产生这套思想的，它缺乏思想的基础和直接的触发点。至于各诸侯国，正在扩张崛起、摩擦不断，岂肯用克让谦柔之道来约束自己？即使在此后诸侯争霸的战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也不大可能产生这种思想。

国学大师王国维曾高度评价周代制度：“……自其表言之，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，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；而自其里言之，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，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，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。”（《王国维经典文存·殷周制度论》）王国维所说的“万世治安”，正是西周初年建立各种制度、文化的宗旨，由此宗旨出发而产生了以趋吉避害——“无咎”为核心思想的《周易》，以及三千礼仪的缜密规范体系，事实上在这番心思的经营下，周朝子孙也得享国祚“八百载，最长久”（《三字经》）。回头来看原始本《老子》“克攘”、“谦谦”的君道，与《周易》思想一脉相承，意欲通过处弱谦下、修善积德以求王位长久。

平王东迁之后，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地位虽名存实亡，却得以绵延五百年，或许与其子孙谨遵这套谦道思想有一定的关联吧——“小邦以下大邦，则取于大邦”。但最初《老子》提出谦退主张绝不是守弱自保，“圣人之能成大也，以其不为大也”、“将欲歛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去之，必固与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予之”、“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”……可见所谓的卑弱克让，不是以弱为弱、以让为让，而是以弱图强、以让谋大。处柔守谦的要义就在于此，一则暂避眼前之危机、锋芒，以曲求全，所谓“潜龙，勿用”也；二则积蓄力量，图谋发展壮大，所谓“飞龙在天”也。这其中蕴藏着深沉的政治智慧。

所以我认为，原始本《老子》诞生的时间点不妨再大胆地往前推一推：这个上承《周易》，中以柔弱之道图谋强大，下之余力或及于东周王室的原始本《老子》，应当产生在天下一统、周王室还相对强大的西周，以适应某种特殊的现实政治需要。搜寻西周历史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契合点——宣王中兴时期。

（二）西周《老子》作于周宣王时期，是周王室复兴的治国纲领

在西周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时期，一个是周公摄政的七年，奠定了成康盛世，并产生了一部时代经典——《周易》。

周公摄政的事迹载于《尚书大传》：“周公摄政：一年救乱，二年克殷，三年践奄，四年建侯卫，五年营成周，六年制礼作乐，七年致政成王。”周公呕心沥血要为周朝夯实万年基业，一番苦心经营换来了“成康之际，天下安宁，刑错四十余年不用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的太平之世。除了一系列政权建设，周公最大的贡献在于文化思想的整理，制礼作乐，整理父亲文王推演出来的六十四卦《易》。他组织大臣为六十四卦系上卦爻辞，完成了对《易》之思想的基本阐释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《周易》经文。《周易》绝非纯学术性的东西，政治服务性极强：鉴于商朝灭亡的教训，见证了周从弱小走向强大的现实，故《周易》思想既有告诫君王积善行德、谨慎避祸的忧患意识——“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”（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），亦有激励人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。况且周王室刚刚夺得政权，正当百废待兴、蓬勃发展的上升时期，所以特别需要一种阳刚之气——

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（《周易·乾卦》）。据称殷代的八卦《易》本来“坤”卦在前、“乾”卦在后，名曰《归藏易》，周公整理时却将“乾”卦置于首位，目的就是要倡导这种积极有为的健行精神。由此来看，以柔顺谦下为治国理念的原始本《老子》，不可能在这个时期产生。但周公领导下的这次周王室文化思想整理，却奠定了此后 3000 年中华文化的基石，居功至伟！

西周另一个重要时期是“宣王中兴”，与时代匹配的原始本《老子》应运而生。“宣王中兴”，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，周朝刚刚遭遇建国两百年来最沉重的一次打击——公元前 841 年的国人暴动。这次国难《史记》、《国语》都记载得很详细。自成康盛世，历昭、穆、共、懿、孝、夷诸王，周朝已是相当的富足，继位的厉王暴虐侈傲，为了阻止国人议论自己的过失，甚至找来卫巫“监谤”：

得卫巫，使监谤者，以告则杀之。其谤鲜矣，诸侯不朝。……于是国莫敢出言，三年，乃相与畔，袭厉王。厉王出奔于彘。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，国人闻之，乃围之。召公曰：“昔吾骤谏王，王不从，以及此难也。今杀王太子，王其以我为仇而怱怒乎？夫事君者，险而不仇怱，怨而不怒，况事王乎！”乃以其子代王太子，太子竟得脱。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

在这次国难中幸存下来的太子静，于共和十四年被周、召二公拥立为王。“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，号曰‘共和’。共和十四年，厉王死于彘。太子静长于召公家，二相乃共立之为王，是为宣王。”此时重获王位的周宣王，遭遇如此巨大的打击后，可以说是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。《毛公鼎铭》真实反映出他当时恐惧敬慎的心理：“改天疾威，司余小子弗及，邦将害吉？……余非庸又昏，汝勿敢妄宁，虔夙夕惠我一人，隄我邦小大猷，毋折殄，告余先王若德。用卬邵皇天，绸缪大命，康能四国，俗我弗作先王忧。”（郭沫若：《青铜时代》22 页）而另一方面，无论从王朝稳定的角度，还是自身家族的利益考虑，宣王都必须来一次振兴——重振王室、重拾民心。而要复兴，当然首先是制定纲领，在思想上进行统一与深刻的反省。

非常的事件——国人暴动，迫切的现实需要——重振王室、重

获民心，周宣王时代的政治主题，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：忧患、复兴。再回头细细品味《道德经》中“卑弱以自持”的君道思想，可以说是“恰逢其时”。《道德经》处处体现着忧患意识，诸如克制私欲、处弱谦下、不与民争利、委曲求全等等；同时，《道德经》中“祸福之所倚，福祸之所伏”的否泰转化思想，更为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。现实的结果是，周宣王励精图治，经过十几年的重建，最终实现了周朝历史上的又一个政治高峰——“宣王中兴”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宣王即位，二相辅之，修政，法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遗风，诸侯复宗周。十二年，鲁武公来朝。”此外，《道德经》部分文字语气相当强硬，如“强梁者不得其死”、“富贵而骄，自遗咎也”、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”等，表明当时情势的紧迫与危殆，也合于周宣王的时代特点。

因此我认为，原始本《老子》产生于“宣王中兴”时期，是周宣王复兴的治国纲领，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：一是针对厉王暴政引发国人暴动的教训，提出君王要克制私欲，谦下修德，切不可再刚愎自用、逞强妄为，如“圣人去甚、去奢、去泰”、“金玉盈室，莫之能守”、“民不畏威，则大威将至”等等，这样的告诫叮嘱书中比比皆是。二是针对周朝实际已从强大走向衰弱，国人离心、诸侯离德的现实，借助“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”（《周易·泰卦》）的否极泰来转化规律，欲树立起重振王室的信心，希望周能从衰弱走向强大，如“柔弱处上”、“祸福之所倚，福祸之所伏”、“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”等等，都是在表达这种思想。为了跟今本及竹简本、帛书本等相区别，姑且将其称之为西周《老子》。

至于西周《老子》的拟订，则应是在周、召二公的主持下，由宣王时期的最高学术权威——周太史来完成。周朝制度，凡遇国家大政，周天子或各国诸侯皆须征询史官意见，以便从前代历史中求得借鉴。《国语·周语·邵公谏厉王弭谤》云：“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瞽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、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。”史官的本职就是为君王著文献书，所以撰写中兴周朝的西周《老子》周太史责无旁贷；而书中出现大量格言警句，正是史官以史为鉴的充分体现。

（三）从五千言本《道德经》中剥离出西周《老子》，再现周宣王时代的治国思想

依据刘歆对道家源流的概述，结合周宣王时代的现实背景，我们尝试着从五千言本《道德经》中剥离出那个西周《老子》（即可能出自西周《老子》的文字）。此时我们逐渐发现，这些已有近三千年历史的干枯文字，仿佛是回到池塘的鱼儿，一下子活跃起来，与那个时代及那个时代的人物是如此地水乳交融。（全文见后面的《西周〈老子〉还原》）

1. 忧患意识：现实的教训与先祖的训诫

■ 圣人之不病也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■ 飘风不终朝，暴雨不终日。孰为此？天地。天地尚弗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！

■ 故圣人之言曰：受邦之垢，是谓社稷之主；受邦之不祥，是谓天下之王。

起首便是重重的告诫，“病病”就是要随时戒惧，规避一切祸害，这样才能永远都没有忧患；天地狂暴尚不得久长，人主行暴政则将自取灭亡；只有忍辱负重，才能成为天下之王……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，在周宣王时期自有其深刻的现实教训。从成王历七代而至周厉王，建国之初制定的“敬德保民”的训典以及克勤克俭的那番小心，在国力强盛、天下太平的好景下逐渐被淡忘，厉王骄奢暴虐之气日盛，国人怨气也日增，结果“监谤”事件成为导火索引发了国人暴动，这个来自内部的打击几乎动摇了周朝的国之根本。我们甚至都可以感受到宣王和他的大臣们的那种震惊与不安，所以他们怎能不忧思戒惧呢？

这种忧患意识，也是秉承了文王的精神。“西伯盖即位五十年。其囚羑里，盖益《易》之八卦为六十四卦。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商朝末年，周文王遭崇侯虎陷害被纣王囚禁在羑里，囚禁中的文王深刻反省，苦心推演八卦《易》，从而研究出一套绵密的趋吉避害、趋利避祸的方法，故《周易》中饱含着文王深切的忧思：
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
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、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？是故其辞危。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倾。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废，惧以终始，其要无咎。此之谓《易》之道也。（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）

“惧以终始，其要无咎”，说的正是避祸的关键，那就是自始至终都要谨慎戒惧，不可懈怠、自大。面对当前严酷的现实处境，周宣王的这位太史还特别叮嘱宣王正视问题的严重性，要学会忍辱负重，要主动承担起国家之不幸与耻辱，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复兴周朝曾经的辉煌，真正成为天下诸侯之王——“受邦之垢，是谓社稷之主；受邦之不祥，是谓天下之王”。而这方面的训诫，早在周初就已明明白白地写进了“礼”中。《礼记·曲礼下》曰：“国君去其国，止之曰：‘奈何去社稷也！’大夫，曰：‘奈何去宗庙也！’士，曰：‘奈何去坟墓也！’国君死社稷，大夫死众，士死制。”《礼记·礼运》曰：“故国有患，君死社稷谓之义，大夫死宗庙谓之变。”

2. 否极泰来：来自《周易》的复兴理论基础

■ 祸福之所倚，福祸之所伏。

经历厉王之难后，周朝可以说是人心惶惶。周王室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，诸侯国不再来朝觐，王畿里民心散乱，朝中大臣们也是各怀疑虑。此时此刻，最紧要的是能安定人心、恢复信心。那么如何安定人心、恢复信心呢？关键是为复兴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。周宣王的这位太史搬来镇国之宝——《周易》，并很快从中找到了依据——以“否”、“泰”二卦为典型代表的对立转化思想。

否：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，大往小来。

《彖》曰：“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，大往小来”，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，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。……内小人而外君子，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也。

“否”卦所设之象的情势，很贴合周宣王所面临的现实处境。周

厉王“监谤”惹来民怨，造成上下乖隔，不就是“上下不交”吗？国人（即“小人”）赶走厉王（即“君子”），周、召共和，不就是“天下无邦”吗？不过，虽然目前危机重重，却正好预示着“否”道已走向尽头，即将朝好的方面——“泰”道转化。

上九：倾否，先否后喜。

《象》曰：否终则倾，何可长也？

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疏：“否道已终，通道将至。故《否》之终极，则倾损其否，何得长久？”“通道”者，泰道也。泰卦与否卦正相反：

泰：小往大来，吉，亨。

《象》曰：“泰：小往大来，吉，亨”，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……内君子而外小人，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也。

通畅达到极点就会闭塞，而闭塞达到极点又会通畅，如此循环往复，这就是否极泰来、物极必反的哲学思想。“祸福之所倚，福祸之所伏”，是对这种规律性认识最生动、最现实的表达。所以宣王和大臣们若能修德克己、同心同德，否极而泰来，周朝将渡过危机并重新由衰弱走向强盛。

在那个遇大事必决于卜筮的西周，在那个人们更愿意相信占卜结果的时代，我们甚至可以作一个有趣的假想：为了配合这个复兴计划，让朝中大臣和诸侯们支持宣王，相信周朝必将复兴，周公、召公甚至举行过一次关于“是否复兴”的盛大占卜活动。就像当初武王病重，周公以身为质设坛占卜一样：

武王病。天下未集，群公惧，穆卜，周公乃被齐，自为质，欲代武王，武王有瘳。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

乃卜三龟，一习吉。启籥见书，乃并是吉。公曰：“体！王其罔害。予小子新命于三王，惟永终是图。兹攸俟，能念予一人。”（《尚书·金縢》）